

反战宣言

战争是恐怖。战争是一个怪物，践踏了人类历经艰辛才获得的人权。战争是存在的绝对低谷。它将曾经文明之地变成一片焦土，满目疮痍。战争揭示了共同生活的失败，政治体系的崩溃。战争是民事权利的终结。战争是残酷的，每个人都深知这一点。然而，军事破坏的回响不断威胁着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个体。在 21 世纪，主权法治国家如何能够容忍，在 1948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人权不再得到捍卫？

法律原则

欧洲文化的发展与法律平等原则密不可分，这一原则于 1789 年 8 月 26 日在巴黎的《人权宣言》中得以确立。法律是在权力差异的调和过程中形成的。事实上，艺术作品、建筑、音乐作品、房屋、街道、广场和公园都是欧洲文化意识的可见、可触摸的见证。这种自我意识通过法律平等得以发展并不断壮大。法律原则是抵抗的语言。

荷马

荷马是所有说唱歌手中最受赞誉的，是古希腊世界中世代相传的吟唱诗人，他们在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600 年间沿地中海东海岸游走，即兴演唱。在生动的传述中，听众成为历史时刻和传奇、神话人物的一部分，他们探讨了生命的问题、悲伤、爱情、复仇、斗争和思乡之情。流传下来的两部长篇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讲述了一段旅程。阿基里斯前往特洛伊的旅程，主题是反思愤怒、怨恨、复仇、斗争与死亡。奥德修斯的旅程则是特洛伊战争后返回故乡伊萨卡岛的归乡之旅，他的家成为好客与友谊的中心。

荷马通过这部长篇史诗告诉我们，野蛮与文明的区别在于好客（Xenia），正是好客孕育了友谊。欧洲建立的法律体系无法脱离地中海的餐桌文化，在那里，人们邀请他人共进餐食，分享食物与美酒。

法律/Nomoi

自公元前 387 年，哲学家柏拉图（约公元前 428-348 年）在雅典创立 *Akademeia* 以来，文化生活以口头希腊传统（歌曲、神话和诗歌）向书面反思性语言的转变为特征。雅典的 *Akademeia* 将语言作为哲学的材料。真理与谎言、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在书面对话中通过论证和推理得以揭示。

柏拉图在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自杀后，作为对雅典市政当局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回应，开始撰写《对话录》。柏拉图在接下来的 15 年里无法从事任何活动，但这段经历也为他创作《法律》提供了灵感。《*Nomoi*》是为一个虚构的殖民地（*Magnesia*）设计的文本，在那里司法将是最高权力，专制统治将不再有机会，人们将相互交谈和协商。这是柏拉图写的最后一部也是最长的对话。司法是对话的产物。

大宪章

英法战争迫使国王与土地所有者合作，后者负责动员军队并资助战争。成立了一个由 25 名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委员会，他们起草了一份协议，将国王的权力与法律绑定。1216 年 10 月 12 日的《大宪章》包含 63 条法律规则。其中一条规定，未经司法命令，任何人不得被逮捕，这条规定被称为《人身保护令》。在与权力发生冲突时，诉诸法官是法律原则，自此在欧洲法律体系中得以确立。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权利/*De iure belli ac pacis*

胡戈·格老秀斯（1583-1645）为暴力统治的政治困境提供了语义学解决方案。他在 1625 年出版的《*De iure belli ac pacis*》一书中提出，海上战争、吞并海外领土、统治“异族”是善良人类的权利。17 世纪，基督教信仰被视为上帝在地球上的善的化身，因此统治被视为善的

传播。他的著作成为海外贸易公司的行为准则，即以“正当”暴力进行统治。荷兰共和国议会颁布了“殖民宪章”。

贸易公司获得了在征服的海外领土上根据当地强制性法规进行治理的自由。正是他们制定了殖民地的法律法规，强行实施垄断，开展军事行动，并拥有自己的军事法庭。战争权是统治者的权利。殖民宪章将殖民地置于共和国法律体系之外。格老提乌斯的战争法为民族间的统治和权力不平等奠定了基础。

1667年8月5日，荷兰议会通过了《永恒敕令》，规定最高军事职务不得与执政官职务兼任。该敕令的起草者包括德维特兄弟，他们主张限制执政官的最高权力。1672年8月20日，两人被谋杀，尸体被吊在海牙监狱大门前的绞刑架上。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当晚在一张纸上写下“*ultimo barbarorum*”。

三权分立

1748年的三权分立原则由查尔斯·德·蒙田（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蒙田与柏拉图一样，旨在保护社会免受专制统治者的暴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离是权力分配的必要条件。蒙田斯基，如同格老秀斯，将目光投向了远方的殖民地，那里殖民贸易公司正日益成功地建立贸易据点。他设想的是一片开放、广阔的世界，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语言和神明，这些将通过人类的“自然理性”实现繁荣。他的《三权分立》成为分配权力的民事法律模型，从而削弱了教会专属的基督教道德以及国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然而，《三权分立》并未在殖民地实施。欧洲法律思想中仍并存两种体系：基于平等原则的市民社会法律秩序，以及用于统治他人的武装殖民权力秩序。这两种体系在原则上相互对立：以法治为基础的文明模式与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统治模式。

《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 / 《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

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中颁布的《人权宣言》，正值公民们意识到并要求自己的声音被倾听、利益得到尊重的时刻。对国家暴力的反抗带来了新的法律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现在要求并明确提出了在国家与统治者之间实现权力平衡。随着人权的描述，人们不再愿意服从更高的中央权力。这种新的、革命性的社会思想开启了对新社会中阶级关系变化的认识。

四年后，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国王在国民公会经过三次投票审判后，被判处斩首。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判处斩首，并于1793年10月16日被处决。他们被指控镇压暴乱、阴谋反对公共自由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他们被指控背叛了人民。司法权从国王转移到了公民手中。

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是法国公民权利的强化，以一部连贯的法典形式确立了平等、财产权和合同自由。拿破仑所到之处，公民都拥有《民法典》。

战场与百万亡灵

19世纪因欧洲大陆上频发的战争而成为血腥世纪。拿破仑战争（1804-1815年），估计军民伤亡人数在350万至650万之间；1816年至1864年的高加索战争，估计有10万人丧生；1821年至1829年的希腊独立战争，估计有80万人丧生；1870年至1871年的法德战争-1871年法德战争，估计有18万至50万伤亡，随后爆发天花疫情，估计有50万伤亡；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估计有50万至75万伤亡。

欧洲各国元首，作为军队总司令并与军队高层紧密合作，面临着社会意识缓慢但稳步增长的局面，认为在民事社会中，军事暴力和战争是不被接受的。此时，军事战争工业正越来越多地为军队提供重复发射步枪、远程火炮、重型爆炸物、机枪、机械化运输和电报通信等武

器装备。

关于《社会契约》/《社会契约》与新教育学

战争暴力导致人们相互残杀，人的形象受到了沉重打击。正是让-雅克·卢梭（1712-1778）没有从内在定义人，而是从外在定义人：人是环境塑造的，因此必须消除个人成长环境中的暴力和压迫。他在1762年的《社会契约》中写道，公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对个体的义务和自由具有约束力。

约翰·裴斯泰洛齐（Johan H. Pestalozzi, 1746-1827）在瑞士发展了一种基于这一新哲学的学校体系，其教育学旨在支持儿童的自然发展。这一新的教育理念以理解阻碍儿童发展的因素为出发点。暴力是个人发展最严重、最阻碍的因素。他称之为“头脑、心灵与双手的教育学”。他认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对人类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1798年，他在瑞士的斯坦斯创办了一所战争孤儿学校。1805年，他在日内瓦湖畔的伊韦尔东创办了一所人民学校。其目标是为每个孩子提供教育。

《共产党宣言》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于1848年2月21日在伦敦发表了他们的宣言。该宣言呼吁反对国家暴力和压迫的社会活动。该宣言包含一个政治纲领，旨在废除资本主义现存的权力结构，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剥削劳动、工人和原材料的模式。只有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才能解放工人。阶级意识是核心概念：劳动人民通过团结一致、发展意识，从而摆脱压迫地位，并通过工人阶级的法律地位获得身份和权力。反抗的口号是“你们除了锁链一无所有。”实现平等的必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团结，废除土地私有制和继承权，实行累进税制，国有化信贷、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普遍劳动义务，普及教育，废除童工。反对压迫的最有效模式是罢工。

《共产党宣言》对国家法和法律原则的影响是巨大的：阶级意识取代服从，团结取代斗争，国际主义取代民族主义，教育取代宗教教义，工人取代统治者，变革取代顺从，法律规则取代权力。

日内瓦公约

1864年8月22日，各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规定各国必须为士兵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是亨利·杜南（1828-1910）发起的公民倡议，他通过成立红十字会和发起《日内瓦公约》，建立了《人道主义战争法》：护理人员、医生、救护车和医院都在中立原则的保护下工作。

大众教育

显然，如果不进一步彻底改革教育方法，就无法在政治层面改革社会。裴斯泰洛齐在教育学领域的倡议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玛丽亚·蒙台梭利（1870-1952）凭借其作为医生和人类学家的背景，将对儿童发展不同阶段的关注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教育计划。她于1907年1月6日开设了第一所“儿童之家”（面向3至6岁儿童）。弗朗西斯科·费雷尔（1859-1909），玛丽亚·蒙台梭利的同代人，于1901年在西班牙创办了第一所世俗学校——“现代学校”（Escuela Moderna），该校招收男女学生，采用混合班级，教育不再受宗教和教会支配，而是基于儿童的自由发展，所有儿童均可接受教育。他总共创办了约50所学校。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于1909年在巴塞罗那被军事法庭以虚假指控判处死刑，并于1909年10月13日被枪决。他被指控煽动加泰罗尼亚人反抗神权统治。教会动用军事力量来压制批评性的公民声音。他的处决在整个欧洲引发了大规模示威，数十万人参加，数千人被捕。

和平会议

和平会议的倡议来自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目的是结束导致战争和国家破产的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军队不断壮大，武器成为大规模生产产品，大国之间的持续不信任加剧了破坏性工业战争的风险。沙皇尼古拉二世收到了银行家伊万·布洛赫（1836-1902）所著的《战争的未来》一书，该书于1898年在巴黎出版，布洛赫在书中警告了军事化国家的危险。

然而，真正的和平主义源于社会，它是由对残酷军事主义的普遍社会厌恶所塑造的。贝莎·冯·苏特纳（1843-1914），欧洲和平运动的领军人物，于1889年在德累斯顿发表了她的和平主义宣言《放下武器》，并成为日益壮大的和平运动中的重要声音。

1899年，在海牙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上，有26个国家派代表与300位嘉宾参加了会议。下图为贝莎·冯·苏特纳与她的女权主义、和平主义朋友安妮塔·奥古斯堡（1857-1943），她作为律师与罗莎·卢森堡（1871-1919）合作，以及玛格丽特·塞伦卡（1860-1922），她作为人类学家研究人类进化。她的朋友伊万·布洛赫（Ivan Bloch）也陪同出席。她在日记中写道，为了废除战争、暴力和压迫，“必须产生一种新的人类”。

《海牙公约》包含一项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条约。该声明中禁止使用毒气和英国的杜姆杜姆子弹。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会议规定国际争端必须通过仲裁解决。1913年独特的和平宫在海牙正式开放。这里是国家间争端仲裁法院的所在地。欧洲政治现在可以有效地推行和平政策。荷兰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激烈反对者费迪南德·多梅拉·纽文胡伊斯（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 1846-1919）挑衅地喊道：“和平宫已经开放，战争可以开始了！”

反军国主义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和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以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为基础，在德国发起了一场反军国主义运动。在他们的分析中，资本主义及其等级制度的阶级社会依赖于军国主义和压迫性的殖民政策。废除资本主义不可能不废除军国主义，不废除武装，不废除殖民地。

他们与法国历史学家、法国大革命的杰出代表、阶级斗争的著名倡导者让·饶勒斯（1859-1914）分享了反军国主义立场。1914年7月2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6次社会主义国际局会议上，罗莎·卢森堡和荷兰的皮特·特罗尔斯特拉（1860-1930）也出席了会议，他呼吁举行一场反对军事升级和战争的“全欧洲总罢工”。让·饶勒斯于1914年7月31日在巴黎蒙马特街的一家咖啡馆露台上被一名年轻民族主义者刺杀。三天后，即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战争带来了大量证词：士兵、护士、平民、作家、诗人通过详细描述，记录了战争的现实、恐怖与暴力的疯狂。其中一些著名的描述包括亨利·杜南的《索尔费里诺的回忆》（1862年），亨利·巴布斯的《地狱》（1908年）和《火焰》（1916年），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1907年），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1916年），以及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的《第146号海岸》（1914年）。这些并非战略家和军事将领撰写的传统英雄史诗，而是对现实的直接描绘。在1916年7月1日至11月18日的索姆河战役中，四个月零半个月的时间里，170万士兵丧生。英国损失42万人，法国20万人，德国45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结束。

书面证词，从书信、诗歌到叙述、报告、日记、传记和遗嘱，展现了人类深刻失望的灰暗画面。这些作家得出结论，停止战争和武装是实现和平生活的唯一选择。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因其革命的、反军国主义的立场，于1919年1月15日在柏林被捕。他们在社会民主党中，以及自1915年起在激进的斯巴达克联盟中，都曾明确表达过这些立场。1919年1月25日，他们与另外38名遇害的同志一起下葬，葬礼在柏林举行，成为一场大规模游行，这一场景被凯特·科利维茨（1867-1945）的日记中描述道：“他们被埋葬在一个集体墓地中……墓地周围挤满了人。”

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欧洲继续反对国家军国主义，因为国家对人民的暴力镇压，使人们越来越憎恨国家暴力，因为他们意识到了社会不公。

凡尔赛和约

1899年和1907年的和平会议使各国之间的政治协商正常化，并规定了国际争端的仲裁。和平运动对此表示欢迎。然而，欧洲各国并未避免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谈判，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举行，明确要求当时的政治领导人将战前的和平理念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亲自前往巴黎，以建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方式，这是一个将所有国家团结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联盟，受到主权和独立权利的保护。结束殖民统治，结束单方面国家利益的权力，结束武装的必要性。《盟约》（1920年1月10日生效）除了包含“领土完整原则”外，还包含“委任统治制度宪法”。那些处于外国统治下的殖民地，由战争的胜利者（先进国家）为其独立做准备。国际联盟的“理事会”确定了所有这些民族（被认为尚未准备好独立的民族）在向独立过渡的法律过程中所需的“权威、控制或行政程度”。旧的欧洲权力观念——统治与被统治——仍然是国际法思维的基础，因此，对被委任统治的人民而言，暴力的合法性仍然是一个现实。

美国从未加入国际联盟。美国参议院于1919年9月16日否决了由其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起草的《盟约》。由于这种明显的美国民族主义，以自卫为名进行的战争和武装力量建设得以继续。

新“委任统治区”的阿拉伯和非洲民众，在未经征求意见的情况下，面临新的边界、指定的统治者以及对自己未来前景的未知，其不满和不信任情绪极为强烈，并引发了欧洲和平运动的强烈抗议。

战间期

1919年至1939年，欧洲处于和平状态。各国继续致力于加强法治：1921年，华盛顿举行海军裁军会议（限制战舰数量），1923年《洛桑条约》关于空军（空军战争法），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关于化学武器（禁止化学武器），1929年《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伤员和病患的待遇以及战俘保护的协议）。

然而，这并未阻止欧洲各国同时扩大军事力量，以争夺国家利益和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争工业而言是武器进一步发展的试验场：坦克、推土机、榴弹炮、机枪、反坦克炮、战斗机、爆炸物和核裂变。

核裂变

在英国，埃尔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在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工作，1909年至1917年间从事原子裂变研究。1917年，他成功地“分裂”了原子。这是核物理学的开端，所有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都继续在这方面进行研究——最终实现了原子弹的制造。

北大西洋条约

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起草的《大西洋宪章》，是战后权力分配的法律文件，规定美国和英国在战后国际组织中应发挥平等作用，该组织随后成立：联合国。罗斯福和丘吉尔为起草《宪章》举行了13次秘密会晤。《大西洋宪章宣言》于1941年8月4日在美国纽芬兰的阿根蒂纳军事基地签署。《宪章》规定：美国和英国不得进行领土扩张，领土变更须征得相关人民同意，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降低贸易壁垒，促进全球经济合作和社会福利，参与国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饥饿和恐惧的世界，参与国致力于海上自由，战后对侵略者进行裁军和全面裁军。

英国的核裂变项目通过尼尔斯·玻尔（1885-1962）传到美国。1939年，美国军队领导了曼哈顿计划，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担任科学总监。制造原子弹的决定已经做出。1945年6月16日，在洛斯阿拉莫斯附近，名为“三位一体”的钚核弹核爆炸试验成功。

泰德·霍尔（1925-1999），曼哈顿计划团队中最年轻的科学家，意识到这种毁灭性武器将赋予美国的力量将威胁世界和平。1944年10月20日，他年仅19岁时成为苏联间谍，并成功传递了制造钚核弹所需的关键信息。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改变同盟关系，改变了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变得脆弱。1945年10月24日，美国在旧金山成立了联合国（取代了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其成立条约由51个国家签署。安全理事会 *Security Council* 于1946年1月17日在伦敦成立，专门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常任理事国为：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中国。

多项和平条约被制定，其中巴黎条约于1947年2月10日首先签署。1948年12月9日，《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获得通过。这是一项国际条约，各国在其中声明灭绝种族罪是犯罪行为。该公约是首个要求各国承担追诉和预防灭绝种族罪义务的法律文件：该公约获得一致通过。1948年12月10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确立的人权终于在巴黎香榭丽舍宫举行的联合国第三届大会上被宣布为普世人权并载入国际法。此前，一个由18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在埃莉诺·罗斯福（1884-1962）的领导下，花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埃莉诺·罗斯福是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夏约宫（Palais de Chaillot）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1940年，阿道夫·希特勒在短暂的巴黎胜利游行中，站在露台上，以埃菲尔铁塔为背景，拍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世界人权宣言》被发送给所有51个成员国。其基本原则是：平等、个人自由和生命权！

《世界人权宣言》后来被分为两项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均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

战争罪行

1939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六年，全球有5500万人丧生，其中一半是平民。美国于1945年8月6日对广岛和1945年8月9日对长崎进行了两次原子弹轰炸。1945年8月8日，在伦敦签署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成立由英国法官G·劳伦斯（1880-1971）领导的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纳粹战犯，包括部长和军队领导人。指控罪名是“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在战争背景下）。军事法庭于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举行了12次审判。共有22名被告出庭受审，其中12人被判处绞刑。

1946年5月3日，东京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澳大利亚人威廉·韦伯（1887-1972）

主持。该法庭于1948年11月12日结束审判。共有28名军队和政府领导人受审，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日本天皇未被起诉。

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成立于1949年4月4日，基于1941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由12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由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890-1969）领导。这是一项资本主义国家针对共产主义俄罗斯的集体防御条约，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被称为“冷战”，因为双方放弃了直接的军事对抗。毕竟，双方都拥有核武器。1955年5月14日，作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回应，*华沙条约组织*成立。

北约（NATO）是一个政府间军事联盟。其目的是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保障成员国的自由与安全。该组织下设两个部门：一个民事行政部门（*北大西洋理事会、核计划小组、国际参谋部*）和一个军事部门（*军事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指挥作战委员会、指挥转型委员会*）。总部最初设在伦敦，后迁至巴黎，但随着法国于1966年退出，总部于1967年迁至布鲁塞尔。最高总部（军事指挥中心）自1967年起设在比利时蒙斯以北的卡斯泰乌。1949年至2004年期间，北约成员国从12个增加到32个：1955年西德加入，1999年东欧国家加入，2004年波兰、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加入。

欧洲委员会

1949年5月5日，在10个欧洲国家的倡议下，欧洲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这是一个致力于维护欧洲和平与人权的国际组织。其总部设在斯特拉斯堡。1950年11月4日，在罗马签署了《欧洲公约》。该公约将缔约国所有居民的人权和公民权利纳入了《欧洲人权公约》（EVRM）。欧洲人权法院于1959年1月21日在斯特拉斯堡成立。

《欧洲人权公约》包含一个重要法律原则，即第3至8条，其中明确了生命权和人身不可侵犯权。自决权是这一基本权利的一部分。与此相关的是禁止死刑和酷刑。国家的主动保护义务也载于其中，这意味着国家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保护这些权利。欧洲法院监督人权的遵守情况。

法律原则

国家受法律和司法约束的主要法律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政府受法律约束），法律确定性（政府制定明确规则），平等原则（所有人法律面前平等），谨慎原则（政府在决策时应谨慎），说明理由原则（政府对决策说明理由）、信任原则（政府必须获得公民的信任）、公平原则（政府公平对待公民）、比例原则（政府措施的后果不得对公民造成过重负担）、诉诸法院（公民必须有诉诸法院的机会）。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1955年7月9日，一群物理学家在伦敦发表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警告不要在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发生使用核武器的武装冲突。该宣言强烈呼吁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签署人：马克斯·玻恩、珀西·W·布里奇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莱奥波德·因费尔德、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赫尔曼·J·穆勒、莱纳斯·鲍林、塞西尔·F·鲍威尔、约瑟夫·罗特布拉特、伯特兰·罗素、Hideki Yukawa。

“(...) 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公开承认，他们的目的无法通过世界大战来实现，因此，我们敦促他们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所有争端。”

罗伯特·奥本海默拒绝签署。

法治与军国主义

“冷战”随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2022）领导下的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于1989年11月9日结束。应尽一切努力建设一个世界，其中普遍人权得到尊重，并伴随所有基本权利的保障。联合国《人权宣言》明确表达了希望，即“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守”将使人类摆脱暴力。

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1949年北约的成立以及原子弹的研发，都反映了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其中人权服从于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间权力平衡。国家间的军事联盟依赖于武装力量的忠诚，而军事暴力则是抵御外部侵略的威慑手段。由此引发的军备竞赛被视为发动领土战争以迫使武装力量之间形成权力平衡的必要手段。北约的军事战略通过由成员国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导致作出动用军事暴力的政治决策。这为解决权力冲突而动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

军事武力的使用必然构成对《世界人权宣言》的严重侵犯，而这些权利本应通过司法机构得到保护。（而非由北约武装力量保护）

这就是朱利安·阿桑奇（1971年出生），维基解密创始人，于2006年通过发布视频《附带谋杀》揭露美国军队战争罪行时所指控的内容。阿桑奇自2010年至2024年被美国以间谍罪起诉，面临终身监禁。他于2012年至2019年在厄瓜多尔大使馆获得庇护，并于2019年至2024年被关押在高度戒备的贝尔马什监狱。这也是爱德华·斯诺登（1983年出生）作为国家安全局（NSA）的中央情报局（CIA）雇员所揭露的，他曝光了政府对平民的非法监控。斯诺登于2013年6月23日从香港逃往俄罗斯，并一直居住在那里。

每场战争都会剥夺公民的人权，这种牺牲被包装成自由的代价。公民被号召为国家而战、而死。公民通过国家税收为军备和战争买单，这牺牲了社会、文化和生活所需的必要支持。所有法律原则在暴力行为中被践踏。每场战争的爆发都是对人权的终极侵犯。

国家解除武装是法律原则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国家解除武装是法治繁荣的先决条件。

埃因霍温 2025年8月18日

亨克·维施/伊蕾娜·范斯特拉